



百年新诗成就如何，这个问题必须从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入手，百年新诗其实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国现代性问题发生于1848年鸦片战争之后，但真正开始探求比较全面的解决之道却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反省和检讨中国文化与文明。新文化运动其真正突破恰在于新诗革命。学界一般认为，新诗的发生，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2017年正好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

百年新诗，客观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15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的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新世纪初，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不乏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这是一个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新诗的问题本身就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成败得失。我一直

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新诗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事件，是一种天命。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

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以往讨论过于夸大了新诗与旧体诗之间的巨大断裂，其实，只要新诗还使用汉字，汉字里所有的信息、内容乃至价值意义，就还在传承，就不存在断裂。

### 百年新诗的主要成就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对新思想、新文化变革有着强大的催化乃至推动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诗中，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解放达到极致。郭沫若站立东方遥望地平线，欢呼着新的世纪曙光和时代精神，赞美新的时代气象。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个时代歌手和号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女神》中，郭沫若将五四以后呈现新景象的中国誉为“凤凰涅槃”，寄予新生的希望；这种

对“新”的追求，正是区别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和象征。冰心则是美善与爱的呼唤者，这也许是因为冰心的留学背景，她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对匮乏的关于爱的现代观念，除了母爱、情爱、友爱，更重要的，还有博爱，包括对大自然和世界万物的爱。冰心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爱的哲学”的宣扬，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史意义。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现代意识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加之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悲悯，在流亡道路上相继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革命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郭小川、贺敬之等成为代表诗人。

1970年代末，一批年轻诗人向外学习。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继

续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他们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这就是所谓的朦胧诗。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朦胧诗新的美学追求，得到了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的肯定，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认为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确实，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制于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随后，进入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时期，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杨炼的《诺日朗》、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轻的推动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现代诗歌。台湾现代诗

### □ 赵润田

“五一”期间，一条新近挖掘修整的河流悄无声息地焕发出魔力，让北京前门大街东侧许多已经搬走的老居民纷纷相约回到故地，来看看这个自己曾经居住几十年甚至世代居住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

小河弯弯曲曲，新植的树木还没伸开腰肢，老人们指指点点，辨认着当年的胡同。所有的人都沿着这条小河巡看，而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成为整个这一地区名称的三里河。

即使是年纪最大的老人，也不曾见过这条河，真实的三里河早已湮没于历史。十年前，北京在进行奥运会筹备工程时，也只是在三里河大街挖到了一道明代桥梁。我就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整天南桥湾、北桥湾地叫着，直到那天特地前去，才得见此桥真容。

那一带的老住户，自幼便知晓那一片是曾经有过一条河的，周围街巷的名称也多与河桥有关。如今，三里河重新展现，怎能不让我一样的诸多老崇文人前去一探究竟呢？

出现在老街坊们面前的这条新近挖浚的小河，西端可遥望正阳门城楼，但无法看出水自何处而来，东则戛然而止于一条隔断芦苇园胡同的南北方向的新街。水流极其其曲，浅水中有锦鲤群游，显然为专门放养。桥则极多，小小的，大部为木制。逡巡在这条河边，作为老三里河人，也作为文史工作者，我始终在琢磨它的走向是否依照“古法”，它能够体现哪一个朝代的地区面貌？

作为一条河流，三里河在元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它属文明河的上游，之所以称“文明河”，大抵与邻近文明门（明代南移为崇文门）有关。

元大都的水系有四条，文明河属玉河一流。玉河出自昌平白浮村神山泉，向南汇合一亩泉、玉泉及榆河诸水，由城西流入大都。入京后水分两股：一股从德胜门附近斜入城内，汇为西海（积水潭）、后海、前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和环绕“大内”的筒子河，成为城内最美的风景区；另一股注入护城河，环绕大都。两股水流在城南的汇合点，恰恰就是位于丽正门与文明门之间的东河沿。流经皇城的水道从太庙之东的菖蒲河转入护城河，两条水流在此形成一个十字交

## 三里河之“河”——三里河的前世今生（一）

叉，往南流出城去的，便是文明河。

文明河北起前门东河沿打磨厂，穿过鲜鱼口、兴隆街后偏东斜入北芦草园，至北桥湾南行过桥东向蜿蜒而经薛家湾、水道子、榄杆市、南河漕，再由三转桥拐向东南去十里河、十八里店、马驹桥，入萧太后河流往通州张家湾。由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军需和其他货品，源源不断地沿文明河直抵皇城。文明河一方面疏导京城流水，一方面贯通漕运，在元代确实重要。

进入明代，文明河的水源发生问题，逐渐变成一条死河、臭河、枯河。其实在元代时，由于又开凿了另一条通往大运河的水脉——通惠河，文明河不再是唯一的漕运通道，其地位已发生变化。明代初期，明成祖将城墙南移，正统年间，在新建的南城墙下修护城河，也就在这时，三里河替代了文明河，部分地利用了文明河故道。《天府广记》记载：“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

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

也就是说，三里河的名称，从明初就正式有了。

明朝政府对北京水利的治理远不如元代。京城水流的去向沿两条水道，一条由东便门大通桥走通惠河直奔通州八里桥，另一条就是三里河至张家湾。到底浚通哪条，朝廷始终犹豫不决，诸大臣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前后有三次兴修，均以失败告终，而三里河一带却是水脉不尽而又难得畅通，周遭居民日益增多而河道日益壅塞，河道渐衰而两岸商家住户却繁华起来。

明代朝廷治水无能，宦官们却借河以营私，率先在此引河水营造花园的就是明万历皇帝外祖父武清侯李伟，人称“李园”。《帝京景物略》记载，园内引三里河之水入园为景，可泛舟，建有梅花亭，门窗器物均为梅形。明代围绕三里河有园圃五处：南有李园，北有南官园、北官园和贾家花园，东有平乐园。除李园外，其他

四处后来都成了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明代中期，三里河一带成为居民聚集之地，寺观、会馆和商肆也多了起来，晚清时已是北京民俗生活最集中、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那时，前门大街以西，是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大栅栏、粮食店、煤市街等，以东则是鲜鱼口、兴隆街、大蒋家胡同、肉市胡同、果子胡同等，共同构成了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和娱乐街区。

眼前的新浚小河拐弯处有座不小的亭子，望中北岸临水的宽敞水榭吸引了不少游人拍照，当然这都是新建的，当年我在这一带居住的时候却是没有这些的。那么，河边景象是否以明代初年为旨归，也未可知。

这些新景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能够再现明初三里河的水景，为整个前门东外侧增添了一处景观，此为其“喜”；然而这条小河的出现，割裂并打乱了明中期以后直至拆迁之前五百多年的胡同格局，行走河边，即便我这样的六旬土著都难以在头脑中拼凑出旧日胡同方位，加之河畔老房所剩无几，怅然之情是在所难免的。

### 文化随笔



艺术长廊

绽放

李俊奕／摄

《戒岳捉佳人》《锋铤江湖之决战食神》《大卫贝肯之倒霉特工熊》《猪猪侠之英雄猪少年》《超能龙骑侠》等等，这是2017年第一季度上映的国产电影，不少人可能看片名就晕了。不禁想问能否不这样故弄玄虚把一个片名弄得稀奇古怪的？如今是搞笑的、玄幻的、喜剧的电影票房最好，有票房缺口碑，有技术缺艺术，真正有内涵有底蕴的电影少之又少，能够传之久远永载史册的电影更是难觅踪迹。

翻开中国电影史，诸如《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万家灯火》《早春二月》《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黄土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这些经典电影，片名或简洁写实，或诗意浪漫，或揭示影片题旨，或暗示影片寓意，这些好片名和这些电影的精彩演绎，都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观影人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写作有个说法，题好一半文。一个好的电影片名既能叫人眼前一亮，也能让人终身难忘。诗词佳句作片名，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特色、一个亮点。观众由诗词想到电影，由电影想到诗词。看到1947年史东山编导，由陶金、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少观众自然会想到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看到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由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自然会想到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吴永刚、吴贻弓导演，李志舆、张瑜、仲星火等主演的《巴山夜雨》，片名和意境显然都受到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启发，本片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奖。

有的影片可能因为好的片名或者带诗意的片名而被人记住。读到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会想到1983年刘琼导演，关牧村主演的《海上生明月》。

古典诗词无疑是汉语言艺术的精

正好已经过向外学习，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体现出一种民族美学特质。

21世纪初，则是一个诗歌向下挖掘的时期，也就是诗歌的“草根性”时期，这是一个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时期。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和迅速普及，全球化的加速，教育及文化的民主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创造力。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群体，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当代诗歌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地方性诗歌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度提高，促使女诗人大规模涌现，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深刻改变了当代诗歌的格局。

百年新诗万事俱备，现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确立民族主体性和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具有典范性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只有在这样多维度的融域视野中，当代诗歌的高峰也才会出现。

### 文艺史话

### 杂文撷英

## 给电影取个好名字

### □ 瞿孝军

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作为现代综合艺术的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提供并展现独一无二的。不只是片名，古典诗词对影片内容的表达同样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电影《林则徐》中“林则徐登高远眺、目送邓廷桢乘船沿江远去”那段镜头，就充分体现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这是把诗词语言转化为电影语言的经典范例，只是现在坚持这样做的电影少而又少了。

也许有人会说，电影只要内容精彩好看就可以了，何必计较片名好不好。内容精彩固然好，但是，如果又有一个好片名岂不更好？拍有诚意的电影就请从给电影取个好名字开始吧！